

论唐代试律诗的制度特征

汤燕君

摘要：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唐代试律诗自有其特定的创作场合、写作目的、体制规范、标判标准。它在命题用意上的实际性，写作体制上的规范性，以及创作模式上的固定化，正是其受科举考试制约而形成的有别于文学性诗歌的制度特征。通过分析其“别是一家”的特征，可以从一个侧面为科举文体独立评价体系的确立提供借鉴。

关键词：唐代；科举；试律诗；特征

作者简介：汤燕君，女，讲师，浙江大学博士生。（浙江财经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310018）

中图分类号：I207.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5-0113-06

自20世纪80年代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面世以后，大陆地区逐渐掀起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的浪潮，先后出现了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陈飞《唐代试策考述》、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等专著，相关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或者从科举制度下的文人心态入手，探讨科举与文学的关系；或者以科举制度的衍生现象为考察对象；或者将研究视角延伸至选官领域，深入至具体的科举试项；或者将视角定格于某一文学体裁与科举的关系，为唐代科举与文学研究开拓了思路，提供了借鉴。然而，在人们纷纷将视线投向这一领域的时候，科举文体的研究却始终相对沉寂。人们往往囿于对“文学”的定义，认为应试作品缺乏佳作，无甚研究价值，大多只是在论及科举制度时，略涉应试作品的影响与作用，也多持否定态度。虽然自本世纪初始，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就总体来看，研究力度和深度皆有待加强。尤其重要的是，适用于科举文体的独立评价体系尚未确立，这对我们客观评价科举文体的价值、意义形成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我们试图从唐代试律诗入手，通过分析其在科举制度规定下表现出来的“别是一家”的特征，从一个侧面探讨科举文体的评价标准。

一、命题用意的实际性

试律诗，指唐代科举考试所作诗歌。唐高宗永隆二年（681）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其中规定“自今以后，考功试人，…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

并令试策”^[1]。初，杂文试多以铭、赋、颂为内容，至垂拱二年（686）始出现试诗，开元末天宝初试诗逐渐定型，成为最富唐代色彩的一个试项。现存唐代试律诗主要保存于《文苑英华》卷一百八十至卷一百八十九，少量未收者，散见于《全唐诗》。今人罗积勇、张鹏飞《唐代试律试策校注》对试律诗作了整理、校注，为科举文体的研究提供了便捷。

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试律诗自有其特定的创作场合、写作目的、体制规范、评判标准。要了解这一制度规定下的文学体裁，我们不妨先从其命题用意说起，因为试律诗题不仅代表着官方意志，也规范着写作内容，引导着写作思路。有别于一般的同题唱和、应制酬唱，试律诗在命题上主要表现出以下特殊的用意：

（一）利于文才选拔

科举试诗，出发点在于分清良莠，择优汰劣，公平地考量应试者为官从政的基本文化修养。因此命题既要保证一定的选拔空间，使举子能够一展才思；又应有利于区分高下，不宜太过简单或宽泛。

考察现存唐代试律诗题，大多“不于异书之中固求深僻题目”，“贵令所试成就，以观学艺浅深”^[2]。比如大部分诗题可从景物或场景描写入手，有利于考生描绘形象，营造意境。再比如同为大经，典出《礼记》的有21题，典出《左传》的却只有3题。同为中经，典出《诗经》的有10题，典出《周礼》和《仪礼》的却没有。数量的悬殊源于各经难易不同而导致的习经人数多寡和普及程度的不同。“《左传》卷轴文字，比《礼记》多较一倍”^[3]，因而举子多习《礼记》，以至

“习《左氏》者十无一二”^[4]。《诗经》文学色彩浓厚，有韵有律，易于记诵；而《周礼》、《仪礼》内容庞杂，且所涉细节、步骤繁琐，举子大多趋少就易，故“两监及州县，以独学无友，四经^①殆绝”^{[4] (1630)}。诗题设计出自普及程度较高的典籍，一则有利于试诗举子了解题目内涵，熟悉诗题背景，从而将主要精力放在诗歌写作的谋思构篇、字锤句炼上，以尽量展现文思才情；二则有利于实现考试的公平化，使那些无法入官学，只能通过私学、家庭教育，甚至是自学成才的举子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握题旨。

另一方面，多数试律诗题又有较详细的内容限定，对写作者来说可发挥的空间较小，难度较大，而对考评官来说则有利于评判诗歌高下。比如《秋月悬清辉》一题要点有四：一为咏月，二为咏秋月，三须写月光，四须写月光之清丽。如此一来，给考生在立意造境上留下的空间就所剩无几了。再比如《金谷园花发怀古》要点亦有四：一为怀古，二为花发怀古，三须写金谷园的花，四是金谷园的象征意味要写足。考生为了写好符合题旨的诗篇，就不得不在既定的框架内腾挪，不同作品在谋篇布局、遣辞造句上的相似度、重复率便大大提高。是平庸无奇抑或别具一格，个中高下在这样的比较中就会变得更加明显。

（二）适应科考场合

试律诗命题须适应科举考试特殊的时间、地点、场合的限制，向社会昭示繁荣太平、文华璀璨的盛世气象，以发挥其教化社会的作用。因此试律诗题多颂扬主题，而无讽谏内容。

有的试律诗题以朝廷节庆典礼、活动为内容。比如《元日望含元殿御扇开合》取材于正月初一在含元殿举行的朝贺仪式。据《唐会要》卷二十四《受朝贺》载：

元日大陈设。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中书令又以供奉官献寿，时殿上皆呼‘万岁’。^[5]

元日，文武百官、四方夷长、地方使臣、进京举子皆列于阶前拜贺天子，齐祝新年。规模之宏大，场面之隆重，为诸节之首。这样的节日活动颇能显现万国来朝、昌隆太平的泱泱大国风范，有利于营造盛世景象。试律诗以此为题，明显包含称颂意味。再比如《元日和布泽》、《中和节诏赐公卿尺》、《清明日赐百僚新火》等，亦皆旨在显现君臣融洽、天子泽被四方的太平景象。

有的诗题关注唐王朝与周边民族的往来。比如《太常观阅骠国新乐》与骠国献乐一事有关。据《旧唐书·南蛮传》载：

（骠国）古未尝通中国。贞元中，其王闻南诏异牟寻归附，心慕之。十八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诏重译来朝，又献其国乐凡十曲，与乐工三十五人俱。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寻以悉利移为试太仆卿。^[6]

贞元十年（794），南诏归顺唐王朝。骠国国王心向往之，亦于贞元十八年（802）遣其弟来朝，并献乐。此题旨在称颂德宗皇帝王风所化，泽被四方。再比如《诏放云南子弟还国》、《观北藩谒庙》等，亦显示出唐王朝在对外关系中的威仪、自信。

另外，有的诗题以帝王生活、宫苑景物为内容，比如《晓过南宫闻太常清乐》、《晓闻长乐钟声》、《御箭连中双兔》、《望凌烟阁》等，或者展示宫廷生活的庄严肃穆，或者描写君王的文治武功，从侧面起到称颂君王的作用。还有的诗题从天人相感的角度借由祥瑞征兆的出现，称颂帝王功迹，营造太平盛世的氛围，比如《越裳献白鹿》、《华山庆云见》、《上党奏庆元见》、《方士进恒春草》等。唐人十分重视祥瑞，相信祥瑞的出现与天子圣明、天下大治有着对应的关系。借由科举的途径来强化祥瑞政治的建设，推动“文质彬彬”社会局面的形成，实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三）符合朝廷需要

科举试诗旨在培养、选拔符合朝廷思想、道德标准的文学人才，因此试律诗题多迎合帝王思想，宣传主流价值，彰显朝廷需要。

现存试律诗题中，有关儒家思想的数量最多，有42题；其次为道家，17题；典出佛教经籍的则没有，符合唐代帝王对儒、道、佛三家的内心认知。^[7]唐代统治者非常重视礼的学习，认为“功成设乐，治定制礼”^[8]，“立身入仕，莫先于《礼》”^[9]，“礼者盖务学之本，立身之端，居安之大猷，致治之要道”^{[3] (7398)}。而《礼记》是儒家基本的礼学典籍，其中既有对形而上的礼学思想的探讨，又有具体细致的礼节礼仪规范，还包括了对人生的感悟，对道的体味。通过学习《礼记》，可以在体——用两方面获得儒家礼学的指导。这也是《礼记》成为试律诗题中出典频率最高的一部儒家经籍的原因。

时事型试律诗题多应势而设，借热点事件宣扬封建道德，昭示朝廷立场。比如贞元元年（785）的《御制段太尉碑》一题便与泾原兵变，段秀实坚守大义，以身殉国一事有关：

（建中）四年，朱泚盗据官阙，…泚以秀实尝为泾原节度，颇得士心，后罢兵权，以为蓄愤且久，必肯同恶，乃召与谋议。……语至

① 《周礼》、《仪礼》、《公羊》、《谷梁》。

僭位，秀实勃然则起，执休腕夺其象笏，奋跃而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我岂逐汝反耶！”遂击之。泚举臂自捍，才中其颡，流血匍匐而走。……凶党群至，遂遇害焉。……德宗在奉天闻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兴元元年二月，诏曰：“见危致命之谓忠，临义有勇之谓烈。……可赠太尉，谥曰忠烈，…并委所司访其事迹，续具条奏，当加褒异，赐其井赋。图形云阁，书功鼎彝，以彰我有服节死义之臣，传之不朽。”德宗还京，又诏曰：“赠太尉秀实，授乎贞烈，激其颓风，…仍于墓所官为立碑，以扬徽烈。”自贞元后累朝凡赦书节文褒奖忠烈，必以秀实为首。^[10]

泾原兵变让一直处于中兴梦想中的德宗皇帝措手不及。当时的唐王朝迫切需要像段秀实这样的忠臣义士出现。为此，唐德宗追封段秀实为太尉，官为立碑，亲撰《赠太尉段秀实纪功碑》，扬其忠烈。这一试律诗题无疑进一步将这种褒奖忠烈的风气推向了全国。再比如《恩赐魏文贞公诸孙旧第以道直臣》一题便源于唐宪宗对忠贞直谏臣子的需要。史载，宪宗“读列圣实录，见贞观、开元故事，竦慕不能释卷”，曾言“太宗之创业如此，玄宗之致理如此，既览国史，乃知万倍不如先圣。当先圣之代，犹须宰执臣僚同心辅助，岂朕今日独为理哉！”^[11]因此，他一方面提高宰相权威，一方面面向社会昭示其礼遇贤臣之心。元和四年（809），宪宗下令出钱赎买魏征故居归还其子孙，以扬其忠贞直谏的品行：

（元和）四年三月，上览贞观故事，嘉魏征谏诤匪躬，诏令京兆尹访其子孙及故居，则质卖更数姓，析为九家矣。上愍之，出内库钱二百万赎之，以赐其孙稠及善冯等，禁其质卖。^[12]

元和五年试律诗出此题目正迎合了宪宗的这种心理，传达了他“道直臣”的用意，也应合了那个时代的需要。

科举制度使政治的需要和个人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个体自觉地从属于这样的需要。因此，试律诗在命题用意上注重吻合唐代社会主流意识，宣扬封建道德价值观，以发挥它引导社会风气、塑造人才品性的作用。

二、写作体式的规范性

出于考试公平性、评判标准化的考虑，试律诗在体式上具有自己既定的规范。举子们只能根据题意，在限定的体式中尽量写好。谁可以戴着镣铐跳出最曼妙

的舞姿，谁就可以获得知贡举的青睐。这是一种局限，也是一种挑战。规范越多，挑战越大。

唐代试律诗一般限为五言六韵律诗，每联内部平仄相对，各联之间须严格遵守粘对规则，中间几联应对仗工整，鲜有例外。现存唐人试律诗五言二韵者仅祖咏《终南望余雪》、阎济美《赋天津桥望洛城残雪诗》两首，前者写于进士科试诗实行不久，后者乃因时间不够，未能完篇，皆为知贡举有意放行，属特例。四韵者存诗9题10首，八韵者存诗10题14首，或为特意命题所限，或为賍帖之作。比如王季友、吕温贞元十四年（798）进士及第，当年试题为《青出蓝》。据《吕衡州集》，《青出蓝诗》题下注：“题中用韵，限四十字成。”今考王季友诗亦四韵，以“青”为韵，故此四韵者当属知贡举自行规定。《品物咸熙》为乾宁二年（895）的重试诗题，已无存诗。据《甫阳黄御史集·别集》引《唐昭宗实录》载：“内出四题，…《品物咸熙》，七言八韵成。”^[13]可知，重试诗题由皇帝所命，此七言八韵亦是特例。王贞白《宫池产瑞莲》题下注“帖经日试”，吕温《河南府试賍帖》，皆为賍帖诗^①，四韵。由于賍帖并不常有，命题乃临时决定，故形式相对灵活，可不受六韵限制。

用韵一般有两种情况：其一，题中用韵，即举人可选择题中任意一字为韵，比如贞元九年（793）《风光草际浮》，今存诗六首，张复元等二人用“光”字，陈璿等二人用“浮”字，刘禹锡用“际”字，陈祐用“风”字。其二，指定题中某字为韵。比如贞元十六年（800）《玉水记方流》，白居易诗题下注：“以流字为韵，六十字成”^[14]。今存六首作品皆用“流”字。偶有特例，比如大历十三年（778）《小苑春望宫池柳色》，存诗10首，皆用清韵，应是知贡举另定韵字。再比如苏珏《御箭连中双兔》，用仙韵，押的是“箭”的平声韵。陈季《鹤警露》，用清韵，押的是“警”的平声韵。这在后代被视为出格，但在唐代却是允许的。韵脚绝大多数为平声，今存试律诗作品押去声韵的仅5题8首，押入声韵的仅4题8首。王兆鹏统计了189首试律诗的1142个韵脚，其中押阳声韵的诗歌数量占76.19%；阳声韵韵脚占77.93%。^[15]可见，唐代试律诗多以押阳声韵为主，这和阳声韵字发音响亮，声韵悠扬，利于展现颂美之情不无关系。

试律诗的体式有明确严谨的规则可循，意味着评阅也有相对客观的标准可守，且这种标准易于掌握，便于执行。诗歌创作与鉴赏本是非常主观的艺术活动，要将

① 所谓“賍帖”，指帖经被落，许以诗賍。为了让某些经学基础差但又确有文才的举子不至于在帖经环节被黜落，天宝初开始，在省试中允许以诗賍帖。

之纳入公平、公正的考试场合多少有些不切实际。然而，律诗寓变化于整齐的特点，既保证了评阅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又能发挥评阅者的主观能动性，使人才选拔的过程显现出规范性和灵活性相统一的特点。胡震亨言：“按其声病，可塞有司之责。虽知为文华少实，舍是益汗漫无所守耳。”^[16]可谓看到了试律诗体式规范化的必要性。而另一方面，试律诗写作偏向外在形式锤炼的倾向，正是科举制度追求考试公平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三、创作模式的固定化

虽然科举试诗贯穿了初、盛、中、晚四期，在各个不同时期，人们对试律诗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但从总体来看，符合题旨、音韵流美、文辞典丽、风格雅正是评判的基本标准。为了争取在同质化竞争中胜出，参加试诗的举子本可以在立意、结构、语言等方面多加尝试，然而由于考试时间有限，临场氛围紧张，写作内容受限，体式规范严格等各种原因，任何大胆的尝试稍不注意就可能导致落第的悲剧。因此，举子们大多小心谨慎，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寻求应对考试最保险的方法。所以唐人的试律诗虽然没有像八股文那样，有着严格的结构要求，但也逐渐形成了自身相对固定的创作模式。

（一）结构稳定

一般来说，试律诗由释题——铺陈——抒情（议论）三个部分组成，即逐字点出，敷陈题意；逐层展开，详细描述；抒发情致，表达感想。沈德潜更将此细述为：“起联点题；次联写题意，不用尽说；三四联正写，发挥明透。五联题后推开；六联收束。”^[17]比如贞元十五年（799）《行不由径》，共存诗4首，具体如下：

欲速竟何成，康庄亦砥平。天衢皆利往，
吾道本方行。不复由蓬径，无因访蒋生。

三条遵广道，九轨尚安贞。紫陌悠悠去，
芒尘步步清。谿台千载后，公道有遗名。

——孟封绅

邪径趋时捷，端心恶此名。长衢贵高步，
大路自规行。且虑萦纡僻，将求坦荡情。

诤同流俗好，方保立身贞。远迹如违险，
修仁在履平。始知夫子道，从此得坚诚。

——王炎

田里有微径，贤人不复行。孰知趋捷步，
唯恐异端成。从易众所欲，安邪患亦生。

谁能违大路，共此竞前程。子羽有遗迹，
孔门传旧声。今逢大君子，士节再应明。

——张籍

古人心有尚，乃是孔门生。为计安贫乐，
当从大道行。诤应流远迹，方欲料前程。

捷经虽云易，长衢岂不平。后来无往路，
先达擅前名。一示遵途意，微衷益自精。

——俞简

诗题典出《论语·雍也》：“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18]四首诗皆先释题义，表明主旨；再结合典故详细陈述；最后或称颂先贤，或表达心志，在结构上无甚区别。此年状元孟封绅所以能够胜出，主要在其立意的别具一格。另外三首皆从原典出发，将小径与大路、大道相对，称颂前贤行为光明，心胸坦荡。唯独孟封绅能不受原典束缚，由小径联想到三径^①，称慕蒋诩品性高洁，以表心迹，较之其他三首更胜一筹。

试律诗创作于考场之上，这种以登榜及第为目的的急就章式的写作，不可避免地在结构上表现出约定俗成的单一。阮阅《诗话总龟》引《丹扬集》云：“省题诗自成一家，非他诗比也，首韵拘于见题，则易于牵合，中联缚于法律，则易于骈对，非若游戏于烟云月露之形，可以纵横在我者也。”^[19]人们既无法像在日常环境中那样气定神闲地构思谋篇，又必须最大限度地做到在不出错的情况下使自己的作品显得更好，因此保守的创作成为大多数写作试律诗的人的选择。

（二）主题集中

科举制度既然有其明确的政治目的和选拔意图，在此制度下产生的诗歌也必然地呈现出功利性、政治性的特征。这种功利性主要表现在以诗求举上，而政治性则体现在试律诗颂扬主题的泛滥，当然这二者常常结合在一起。阅读试律诗，我们随处可见这两大主题：

有的试律诗题本身就具有称颂或干谒的意味，举子只要直接申发题意便可。比如贞元八年（792）《中和节诏赐公卿尺》一题与贞元五年（789）唐德宗新设中和节、新增赠刀尺等习俗有关。^[20]在现存的陆复孔、李观、裴度三人的诗歌中，“皇恩”、“圣恩”、“恩泽”、“宠荷”、“圣躬”等称颂之辞比比皆是。再比如钱可复《莺出谷》：

玉律阳和变，时禽羽翻新。载飞初出谷，
一啖已惊人。

拂柳宜烟暖，冲花觉露春。抟风翻翰疾，
向日弄吭频。

求友心何切，迁乔幸有因。华林高玉树，
栖托及芳晨。

① 即汉代兖州刺史蒋诩因反对王莽专权而辞官归隐，于院中辟三径，唯与高士求仲、羊仲相往来之事。

《莺出谷》典出《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后指代及第。此诗以莺喻己、以玉树比主司，以莺栖玉树，表明及第之请。

有的诗题与称颂、干谒无甚关联，但作者仍会想方设法在结尾表达赞颂之情，抒写及第愿望。比如张聿《夏首犹清和》：

早夏宜春景，和光起禁城。祝融将御节，炎帝启朱明。

日送残花晚，风过御苑清。郊原浮麦气，池沼发荷英。

树影临山动，禽飞入汉轻。幸逢尧禹化，全胜谷中情。

诗题典出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夏首犹清和，芳草亦未歇”。从题目来看，似纯粹的写景之作，然而张聿在描写完春末夏初之景后，由鸟禽转入莺出谷的典故，以“幸逢尧禹化，全胜谷中情”作结，在表达及第愿望的同时，表明自己生逢盛世、得遇明主的庆幸。而且作者刻意以“禁城”、“御苑”为描写对象，一再展现皇宫内苑的清和之景，无不暗含称颂意味。再比如殷文圭《春草碧色》：

细草含愁碧，芊绵南浦滨。萋萋如恨别，萋萋共伤春。

疏雨烟华润，斜阳细彩匀。花粘繁斗锦，人藉软胜茵。

浅映官池水，轻遮辇路尘。杜回如可结，誓作报恩身。

前五联以清丽的笔触构建了一个细雨斜阳、春草冉冉、落花满径、伤春伤别的景象，结尾却忽然转到结草相报的典故，申明自己感恩图报的心理。虽然典故由春草引发，但与全诗主旨无甚关联，显得颇为突兀。想来倘若不是应试之作，作者也不会如此作结了。

试律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与明确的功利性，这是它作为科举制度产物的必然属性。正如沈德潜所言，举人在创作试律诗时往往“得失荣辱之念，先存于中，揣摩主司之好尚，迎合君上之意旨”^[21]。在科举制度下，无论是出题者、还是写作者都在相当程度上显示出对封建体制的献媚姿态，封建统治者需要的臣民的奴性在这里得到滋生与壮大。

（三）风格固定

试律诗的政治性与功利性不仅限制了它的主题，也决定了它的风格。一般来说，试律诗大多写得语言典丽，风格雅正，符合儒家审美观念。

试律诗的景物描写多取富有盛世意味的意象。比如张嗣初《春色满皇州》：

何处年华好，皇州淑气匀。韶阳潜应律，

草木暗迎春。

柳变金堤畔，兰抽曲水滨。轻黄垂辇道，微绿映天津。

丽景浮丹阙，晴光拥紫宸。不知幽远地，今日几枝新。

全诗所选景物“淑气”、“金堤”、“辇道”、“天津”、“丹阙”、“紫宸”，所用描写“轻黄”、“微绿”、“丽景”、“晴光”，既点题中“皇州”二字，又写出春意之盎然，显示了一片政清人和的景象，颇具雍容雅丽的美感。再比如《春水绿波》一题，典出江淹《别赋》：“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现存朱休的作品却完全不取江淹原作伤感别离的意味：

芳时淑气和，春水澹烟波。泥漾滋兰杜，沦涟长芰荷。

晚光扶翠激，潭影写青莎。归雁追飞尽，纤鳞游泳多。

朝宗终到海，润下每盈科。愿假中流便，从兹发棹歌。

全诗用轻丽的笔调尽情抒写春季美丽和煦的风光，充满着欢乐祥和的气氛和乐观昂扬的精神。

唐代试律诗的抒情也往往具有平和、舒缓的特点，常常被用来展现高尚贞洁的品质，这对其雅正风格的形成也不无裨益：

飞雪伴春还，春庭晓自闲。虚心应任道，遇赏遂成山。

——刘昫《积雪为小山》

白云生远岫，摇曳入晴空。乘化随舒卷，无心任始终。

——周存《白云向空尽》

信是天然瑞，非因朴斫成。无瑕胜玉美，至洁过冰清。

——严维《水精环》

瑶池惭洞澈，金镜让澄明。气若朝霜动，形随夜月盈。

——卢纶《清如玉壶冰》

写飞雪，则春庭自闲，虚心任道，意兴萧疏，方家举止；写白云，则生于远岫，乘化舒卷，浑写大意，自在涌出。玉环、壶冰，或冰清，或澄明，皆品性高洁，托意高远。如此种种，无不显示出唐代试律诗典雅庄重的美学风范。

对举子来说，创作试律诗的目的只有一个：及第。为了实现入仕理想，他们必须把自己打磨成封建王朝所需要的样子。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说：“退因自取所试读之，乃类于俳优者之辞，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诚使古之豪杰之士，若屈原、孟轲、司马迁、相如、扬雄之徒，进于是选，必知其怀惭。”^[22]依存于

科举制度中的人注定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独立意志的坚持,成为所谓“识形势,善候人主意”^[23]者。因此,试律诗在创作模式上表现出的固定化,或者说局限性是其应有之义。

四、结 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科举文体是一种在科举制度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的文学体裁,它的存在与发展无不受到科举制度的限制与规定。与其说它是一种文学现象,还不如说它隶属于制度层面来得更为恰当。以往研究者对其评价不高的主要原因是以艺术的眼光来衡量科举文体,认为这些作品大多缺乏佳作,没有什么研究价值可言。若从文学鉴赏的角度来看,这样的结论固然不错,但将科举文体与科举制度剥离开来,单纯评价其文学价值的研究思路本身就存在问题,就像我们不能要求萝卜如西瓜般甘甜,青草如大树般茁壮一样,我们不能用衡量一般文学作品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特殊的“制度——文学”作品。

唐代科举试诗,其作用主要在于:一,引导社会风气,营造意识形态教育氛围;二,培养应试者从政的思想道德素养,使其可以适应朝廷需要;三,公平考察应试者为官的基本文化修养。其构建一整套命题、创作、评判机制的出发点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上述作用的发挥,而我们对试律诗价值的认识似乎也应以此为基础。

参考文献:

- [1] 宋·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卷一百〇六)[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549.
- [2] 五代·刘昫. 旧唐书(卷十六)[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88.
- [3] 宋·王钦若. 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7399.
- [4] 宋·王溥. 唐会要(卷七十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627.
- [5] 宋·王溥. 唐会要(卷二十四)[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531.
- [6] 五代·刘昫.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75:5286.
- [7] 池洁. 唐人试律诗的文化解读? J?. 文学遗产,2007(3):136-138.
- [8] 唐·李世民. 帝范(卷四)[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104.
- [9] 唐·杜佑. 通典(卷十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88:421.
- [10] 五代·刘昫. 旧唐书(卷一百二十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586-3588.
- [11] 五代·刘昫. 旧唐书(卷十五)[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72.
- [12] 宋·王溥. 唐会要(卷四十五)[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48.
- [13] 唐·黄滔. 甫阳黄御史集·别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348.
- [14] 清·彭定球. 全唐诗(卷四百六十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60:5246.
- [15] 王兆鹏. 唐代科举考试诗赋用韵研究[M]. 济南:齐鲁书社,2004:180.
- [16] 明·胡震亨. 唐音癸签(卷十八)[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7.
- [17] 清·沈德潜. 唐诗别裁集(卷十八)[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584.
- [18] 宋·朱熹集注. 论语集注[M]. 济南:齐鲁书社,1992:54.
- [19] 宋·阮阅. 诗话总龟(后集卷三十一)[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26.
- [20] 五代·刘昫. 旧唐书(卷十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75:367.
- [21] 清·沈德潜. 说诗晬语(卷下)[A]//清·王夫之. 清诗话[C].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54.
- [22] 清·董诰. 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83:5587.
- [23] 唐·韩愈《答吕巽山人书》[A]//清·董诰. 全唐文(卷五百五十三)[C]. 北京:中华书局,1983:5603.